中国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体系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

牛小溪[1],谭立峰[※1,2],刘 芳[2]
(1.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中国 天津 300072;
2. 天津城建大学 建筑学院,中国 天津 300384)

摘 要:海洋文化遗产是与人类涉海活动和海洋观念相关的文化遗产,结合中华海洋文化典型特征分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水下海洋文化遗产、航海海事文化遗产、海疆海防文化遗产、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7类。从沿海11省市中遴选出海洋文化遗产共518个,借助ArcGIS空间统计工具分析了各类型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及整体格局,并与省级行政区划、汉语方言、流域分区相关联。结果表明: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行政区划下遗产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方言区划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地域差异更具解释力;流域区划对遗产资源的整合度更高。最后针对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特征,提出了以发掘省域优势资源为基础,主题阐释框架和海洋遗产廊道相结合的开发建议。

关键词:海洋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遗产资源;宗教与信俗文化;方言区;流域;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3)02-0211-09
DOI:10.15957/j.cnki.jjdl.2023.02.022

System Structure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NIU Xiaoxi[1], TAN Lifeng[1,2], LIU Fang[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rchitectural Cultural Inheritance, Ministry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is related to the marine activities and concepts of mankind. According to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rine cultur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7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Marin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underwater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navigation cultural heritage, coastal defense cultural heritage, marine religious cultural heritage, marine settlement cultural heritage, marin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518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each type of heritages using the ArcGIS spatial statistical tools,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Chinese dialects and watershed div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of all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shows a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state. 2) The distribu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is relatively balan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3) Dialect regionalization is more explanatory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4) Watershed zoning has a high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 combining the them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with the marine heritage corridor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provincial superior resources.

Keywords: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Maritime Silk Road; heritage resource; religion and secular culture; dialect area; river basin; resource development

2008年《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开展海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我国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出“海洋文化遗产”概念,在此后的涉海文件中又陆续提

收稿时间:2022-11-11;**修回时间**:2023-02-11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22JWZD59)
作者简介:牛小溪(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文化遗产保护。E-mail:1196678445@qq.com
※**通讯作者**:谭立峰(197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统聚落、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文化遗产保护。
E-mail:tanlf_arch@163.com

出开展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涉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清海防设施、窑址、海岛文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等涉海文物的调查研究。海洋文化遗产是与人类涉海活动和海洋观念相关的文化遗产，“历史上的人类海洋活动、涉海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科技创造、物质生活、民俗风情等的文化遗存，都是海洋文化遗产”[1]。

1951—1999年，西方海洋考古学发展迅速，直至1992年Westerdahl将海洋文化景观概念引入海洋考古学后被广泛采用，西方海洋考古学也从对单个沉船的研究扩展到对整个海洋文化景观的考虑。为弥合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差距，Westerdahl将海洋文化景观的概念构建为淹没于海洋和陆地上的整个航海网络，包括沿海的聚落、港口、码头，以及相关建筑和其他人类海洋活动、海洋开发的历史遗迹[2]。Henderson等在海洋文化景观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海洋文化遗产由过去人类在沿海以及直接在海上的所有活动构成，包括有形遗迹，如沉船、水下及沿海聚落、港口、海洋生态和地质环境，以及同样重要的无形组成部分，如文化习俗、艺术和语言表现形式、当地技能以及传统和历史知识[3]。Claesson认为海洋文化遗产由有限和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组成，包括位于沿海或水下的史前土著考古遗址和景观、历史性海滨建筑、海船遗迹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海洋传统和生活方式[4]。21世纪初，我国对海洋文化遗产、海洋文化景观①的研究开始起步，涉及到基础理论研究[5-8]、遗产保护和利用[9-11]等方面。曲金良将海洋文化遗产分为6大类，即海底遗产、海岸遗产、海滨岛屿人类海洋活动聚落、历史水域、海洋精神遗产、海洋民俗遗产[11]；赵平等将海洋文化遗产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不可移动海洋文化遗产、可移动海洋文化遗产、非物质海洋文化遗产、海洋线路遗产、海洋记忆遗产、海洋文化景观、已消失海洋文化遗产，并基于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方式，对不可移动海洋文化遗产进行了第二、第三层级的划分[6]；李加林等在借鉴文化景观分类基础上，将海洋文化遗产分为海洋遗址遗迹景观、海洋历史场所景观、海洋乡土景观、海洋聚落景观、海洋关联性文化景观、海洋文化线路景观[7]。

由于研究目的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者对海洋文化遗产概念和分类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综合赋存环境、功能、存在状态等的分类方式[8,11]整体上较全面但重点不突出；②在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框架下，仅在“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类别前冠以“古代海洋文化”进行区分[6]，无法凸显海洋文化的特征；③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分类[7]虽较好弥合了人与自然、海洋与陆地的裂隙，但诸如“历史场所景观”“关联性景观”“文化线路景观”等名词过于抽象，不便于大众获得对中华海洋文化直观和整体性的认知。我国拥有长达1.8万km的大陆岸线和1.4万km的岛屿岸线，先民为适应、利用复杂的海陆环境在数千年的涉海实践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梳理我国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体系及构成是实施有效保护和管理的基础。鉴于此，本研究以突出中华海洋文化典型特征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已有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及区域国际合作问题，构建具有中华海洋文化标识的分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类型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提出对海洋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和开发的建议。

1 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体系构成

1.1 分类策略

1.1.1 突出中华海洋文化特征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古代世界海洋交流体系中地位的重要实证[12]，它体现了我国对外交流中的和平性、互鉴性特征，带有中华海洋文化的基因，与西方侵略扩张、掠夺奴役型的海洋文化截然不同[13]。此外，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海商、航海文化，以戚继光、郑成功抗倭为代表的海防文化，及以妈祖为代表的信俗文化，都是影响深远并带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类型，也是有别于西方海洋文化遗产的关键性特征，必须着重突出强调。

1.1.2 与已有保护管理体系衔接

目前国际针对水下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制定了较为详尽的保护管理制度及应对措施，我国也制定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用以加强对水下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下海洋文化遗产由于赋存环境复杂，保护和管理模式与陆上文化遗产截然不同；而海洋非物

①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第1条的规定，文化景观被定义为文化遗产，代表“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没有任何一条世界遗产标准专门用于评估文化景观，但任何一条世界文化遗产标准都可用来衡量文化景观突出的普遍价值。虽然“海洋文化遗产”的外延较“海洋文化景观”更广，但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海洋文化景观”概念偏重于为更好理解海洋文化遗产所选取的一种视角，因此就研究对象而言应是基本一致的。

质遗产作为一种活态遗产,其保护与物质类遗产又有着很大不同[14];因此,无论从遗产属性还是现有保护管理体系来讲,都有必要将这两类遗产单独列出。

1.1.3 兼顾区域国际合作问题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已成共识,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也都将国际合作作为重要内容予以阐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水下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均涉及到区域国际合作问题[10,15],也是我国能在国际上形成品牌效应的两大遗产类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跨海国际性、海陆一体性及综合性特征[16];水下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南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权属问题还具有历史复杂性。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开展区域国际合作,有助于通过遗产外交重塑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1.2 遗产构成

基于上述考虑,将海洋文化遗产分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水下海洋文化遗产、航海海事文化遗产、海疆海防文化遗产、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表1)。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涵盖了所有涉海活动主题,且其整体价值大于单个遗产价值的总和[17],在分类操作时具有最高优先级。水下海洋文化遗产与航海海事文化遗产一同构建起了淹没于水下及陆地上的整个航海网络[2];海疆海防文化遗产是我国古代海洋观和海权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物佐证[18],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与涉海生活生产活动相关,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海洋传统和生活方式[4]。以目的为导向进行分类,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在具体的研究及保护实践中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及对象

本文研究范围为沿海11省市,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从该11省市八批共1 77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遴选出海洋文化遗产共330处,其中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47处、水下海洋文化遗产5处、航海海事文化遗产40处、海疆海防文化遗产43处、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39处、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156处。此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还包括《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中列出的以及泉州申遗成功的非国保遗产点共37处,总计84处;水下海洋文化遗产除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包括未定级但宣传力度及知名度较高的遗址点15处,总计20处。从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遴选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136处。依据上述518处海洋文化遗产的编号、名称、类型、时期、批次、地理坐标、行政区划等信息建立海洋文化遗产数据库。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信息从国家文物局网站上获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获取;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根据已公布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和泉州申遗成功的遗产点确定外,其他类型遗产的遴选以国家

表1　海洋文化遗产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主题类型	定义	遗产实例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遗存的,能见证东方及东西方各国间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	妈祖庙、上林湖越窑遗址、蓬莱水城及蓬莱阁、永丰库遗址
水下海洋文化遗产	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见证人类涉海实践过程的遗迹	北礁沉船遗址、海坛海峡水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
航海海事文化遗产	与人类涉海航行相关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及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包括港航与海洋经贸史迹、涉海管理机构与设施等	天津广东会馆、老铁山灯塔、太仓海运仓遗址、粤海关旧址
海疆海防文化遗产	为保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保障沿海地区生活生产安定而修筑的防御性聚落、军事工程、相关附属设施以及与海战相关的独特历史遗存	桃渚城、蒲壮所城、大沽口炮台、花岙兵营遗址
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	海洋族群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的,与宗教及民间文化传统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望海楼教堂、泉州天后宫、天妃宫遗址、南海神庙
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	人类有意识地开发、利用、改造自然环境而创造的,反映人类涉海生活的古文化遗址、聚落、传统建筑及相关基础设施等	河姆渡遗址、浙南石棚墓群、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洋浦盐田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类在涉海实践中产生,且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海洋文化表现形式	海洋号子、晒盐技艺、南海航道更路经、妈祖祭典

文物局出版的各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为主要参考依据，比对上述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的定义进行确定。流域区划数据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网站获取；方言区划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中国汉语方言地图整理，借助ArcGIS地理配准工具对栅格图像进行地理配准，并绘制汉语方言区划矢量图。

2.3 研究方法

2.3.1 平均最近邻

根据每个点与其最近邻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计算其最近邻指数，平均最近邻仅考虑各点在空间位置上的关系，不考虑点的属性，在本研究中用来观察各类型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若最近邻指数，即$ANN<1$表示聚类，反之为离散，ANN越小，表明聚类程度越高。

2.3.2 多距离空间聚类

多距离空间聚类主要利用Ripley′s K函数对点数据集进行不同距离的聚类程度分析。本研究中主要用来分析不同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得出最佳聚类距离。如果某一范围内K观测值（ObservedK）大于K预期值（ExpectedK），则该分析尺度下的聚类程度更高，反之离散程度更高；DiffK为ObservedK与ExpectedK的差值，当DiffK最大时，聚类效果较理想。

2.3.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于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的点要素的密度。本研究借助ArcGIS核密分析，计算不同类型遗产点的概率密度，用以观测各类型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参数设置包括搜索半径h和population字段，通过多距离空间聚类取DiffK最大时的ExpectedK值作为搜索半径；参考曲金良[19]及杨国桢[20]对海洋遗产及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将登录年代分为史前、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7个时段，对不跨时段的遗产点population字段赋值为1，跨时段的遗产点依据所跨时段的个数赋值。

3 各类型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3.1 空间分布模式

借助ArcGIS空间统计工具，由平均最近邻结果来看（表2），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最近邻指数均小于1，Z得分绝对值大于2.58，表明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且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集聚程度比具有数量优势的海洋聚落遗址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显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集聚与海丝保护申遗城市联盟有密切关系，各联盟城市或为港口重镇，或历史底蕴深厚，以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申遗为契机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挖掘海丝遗产及其社会价值。海丝文化与遗产主题的结合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但目前其他遗产类型还未能具有相当的品牌效应。

表2 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平均最近邻结果

Tab.2 Nearest neighbor results of each type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类型	数量（占比/%）	*ANN*	*Z*得分	*P*值	分布模式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84（16.2）	0.391	−10.682	0.000	显著集聚
水下海洋文化遗产	20（3.9）	0.573	−3.652	0.000	显著集聚
航海海事文化遗产	40（7.7）	0.741	−3.135	0.001	显著集聚
海疆海防文化遗产	43（8.3）	0.451	−6.892	0.000	显著集聚
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	39（7.5）	0.721	−3.334	0.001	显著集聚
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	156（30.1）	0.509	−11.735	0.000	显著集聚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136（26.3）	0.465	−11.931	0.000	显著集聚

由于点的集聚状态受距离影响显著，在不同尺度下会呈现出迥异的分布模式，为更精确了解距离对各类型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借助多距离空间聚类做进一步量化分析（图1）。结果表明海上丝绸之路、航海海事、海疆海防、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的最佳聚类距离差别不大，分别在186 km、194 km、199 km、183 km左右聚类效果最显著；海洋聚落遗址、水下海洋文化遗产的最佳聚类距离稍小，分别为144 km、139 km左右；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受距离影响最小，在210 km时聚类效果最显著。此外，海上丝绸之路、航海海事、海疆海防文化遗产在410 km范围内均表现为集聚，而海洋聚落遗址和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呈现集聚状态的距离范围要小得多，表明后者的分布模式对空间距离更敏感。

3.2 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多距离空间聚类结果，设定各类型遗产的核密度搜索半径，对各类型遗产点进行核密度分析。从整体核密度来看（图2a），福建沿海地区海洋文化遗产最为密集，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此外在珠三角、山东半岛以及琼州海峡两岸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带也出现了集聚现象。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福建沿海（图2b），以泉州为核心。2021年申遗成功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该申遗项目包含了与城市结构、制度保障、多元社群、商品产地相关的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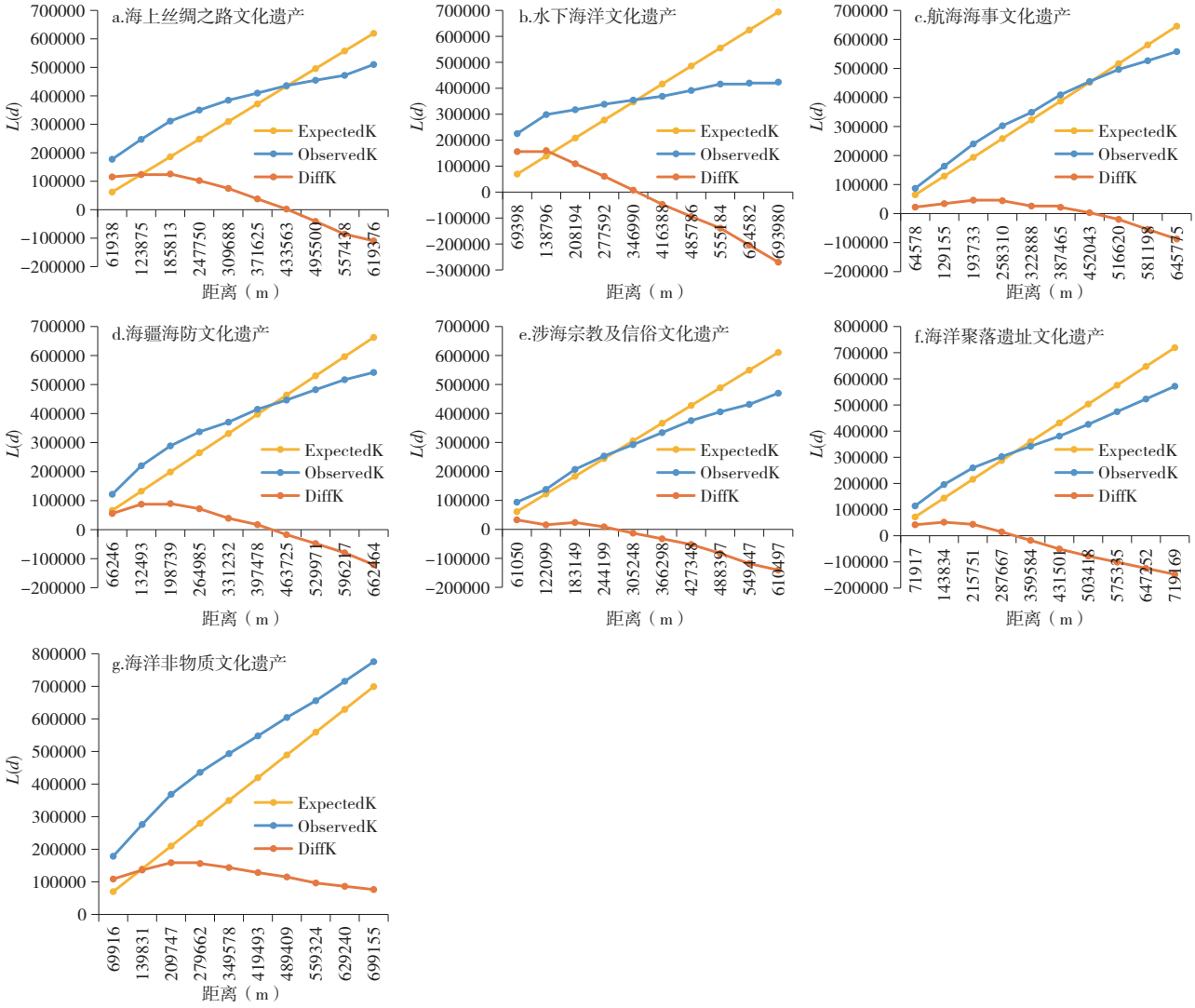


图1　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多距离空间聚类结果

Fig.1　Multi-distance spatial clustering results of various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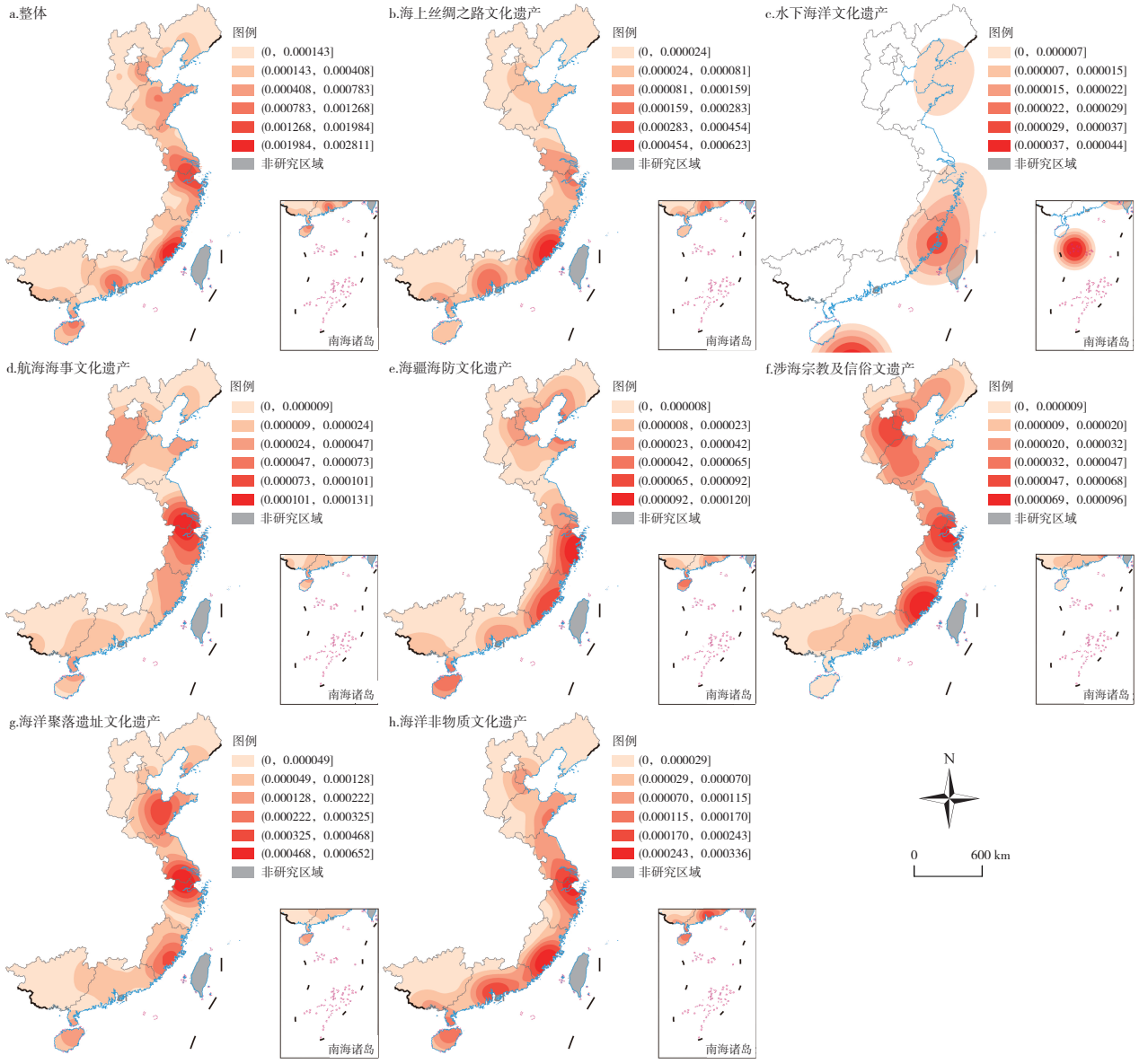
处古迹遗址及空间环境，占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总数的1/4。其他聚集区主要集中在古代各大港口处，具有一定的港口依赖性，如珠三角一带的广州港、北部湾一带的合浦港和徐闻港、长三角一带的宁波港等。北部沿海地区未出现较为明显的遗产集聚现象。

水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较为集中（图2c），且以沉船为主，在海南省三沙市西沙群岛海域最为密集，其次是福建东部海域，以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周边海域。西沙群岛及福建海域的沉船遗址以商船为主，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重要实证；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海域的沉船遗址除商船外，还有甲午战争中的沉舰，如丹东一号沉船遗址、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等。

航海海事文化遗产分布密集区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图2d），由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黄金水道，长三角地区也因此成为内陆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海疆海防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两省（图2e），主要受明清东南沿海严重的倭乱影响，海防文化遗产的时间跨度相对其他遗产类型较短，主要集中在明、清及近现代。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福建、长三角及天津一带（图2f），以妈祖庙为代表的“南神北上”，分布在漕运的重要节点处。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长三角、山东、福建地区（图2g），其中史前海洋性聚落遗址占比较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福建、长三角及珠三角一带（图2h），重心主要位于南方地区，与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一致[21]。

3.3　空间关联特征

由核密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类型遗产分布



注:图件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2号标准地图制作。图3~图5同。

图2 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核密度

Fig.2 Kernel density of all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与行政区划、流域区划相关性较大,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各地区的政治环境,流域区划表征了各地区的自然环境。鉴于方言的不同反映了地方社会文化的显著差别[22-24],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5],增加方言区划用以表征沿海地区的文化环境差异。将各类型遗产分布与省域行政区划(图3a)、方言区划(图4a)、流域区划(图5a)分别进行叠加,提取各区划内不同类型海洋文化遗产的数量作统计分析。

省域行政区划内,总数最多的省份为福建,占全部遗产数的22%,其次为浙江、广东(图3b)。山东省在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中占比最大,为20%;浙江省在航海海事、海疆海防文化遗产中占比最大,分别为25%和23%;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水下、海疆海防、涉海宗教及信俗、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比较大,分别为37%、35%、23%、26%、19%(图3b)。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在资源利用型海洋产业方面始终保有较强优势,其滨海旅游业与海洋经济二者间长期良性互动、共同发展[26]。海洋文化遗产是发展滨海旅游的一大支柱,除历史环境、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外,政府的顶层设计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及合理利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沿海汉语方言共有16个子区域,其中赣语、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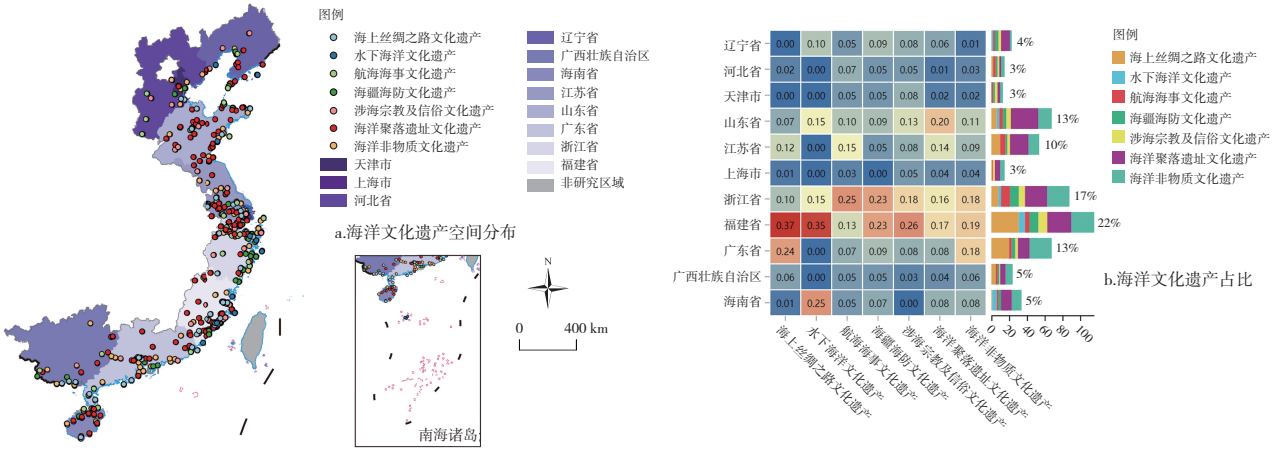


图3　行政区划内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及占比

Fig.3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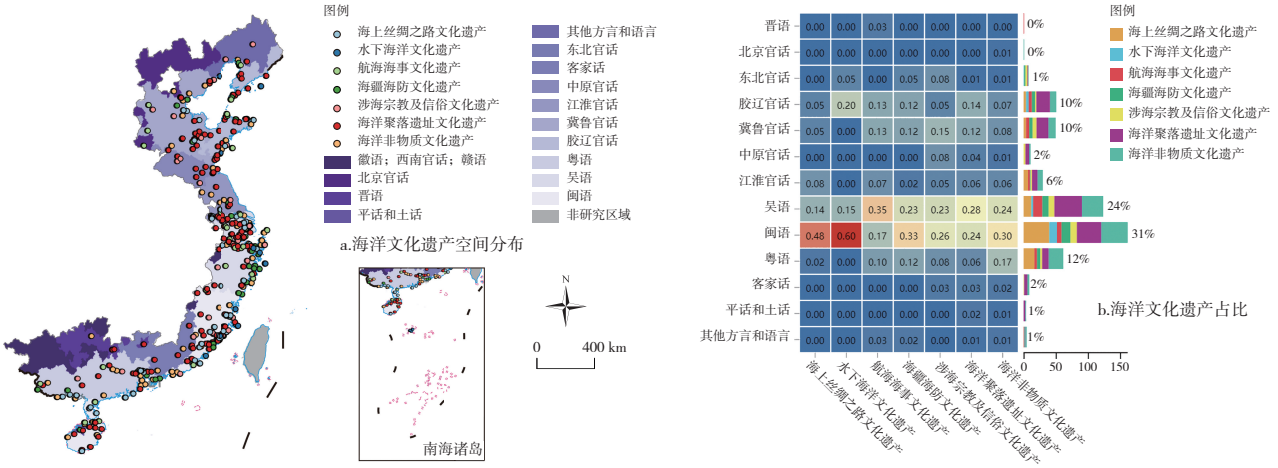


图4　方言区划内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及占比

Fig.4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 region

语、西南官话区无遗产点分布,其他方言区内,闽语区遗产总量最多,占全部遗产数的31%,其次为吴语区占24%、粤语区占12%,均位于南方沿海,仅闽语、吴语两方言区便占遗产总数的一半以上;北方沿海占比最大的为胶辽官话和冀鲁官话区,但均在10%左右(图4b)。从各类型遗产分布情况来看,除航海海事、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占比最大的区域位于吴语区外,其他类型遗产占比最大的区域均集中在闽语区。古代吴语地区居住着百越人,最初的吴语是当地百越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形成的石化了的中介语[27],而吴闽方言关系又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的江浙汉人南迁,其他汉语方言的形成也有类似过程。沿海地区文化融合和移民过程以语言的方式积淀下来,并对地域性海洋文化具有较强解释力。

沿海流域区划共有9个子区域,内陆河片、西南诸河片仅涉及河北、广西的极少部分地区,且无遗址点分布,此外,一半以上的遗产都集中在东南诸河片和珠江流域片,分别为35%和25%,其次为淮河流域片16%,而各类型核密度值均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在遗产数量上并不具备较大优势,仅占14%(图5b)。从遗产分布情况来看,各类型遗产占比最大的区域均位于东南诸河片,且集中程度较高。流域对海洋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源的丰富程度、入海河流对外的联通性及对内的便利性[28]。早期海洋文明的产生依赖于河流提供的初级资源,如适宜的气候、可利用的土地、水等;在此后的发展中河流入海的环境特征在对外交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流入渤海湾的辽河和海河相较流入太平洋的长江而言,前者形成的海生环境更封闭,因此沿海的松辽河流域片区、海河流域片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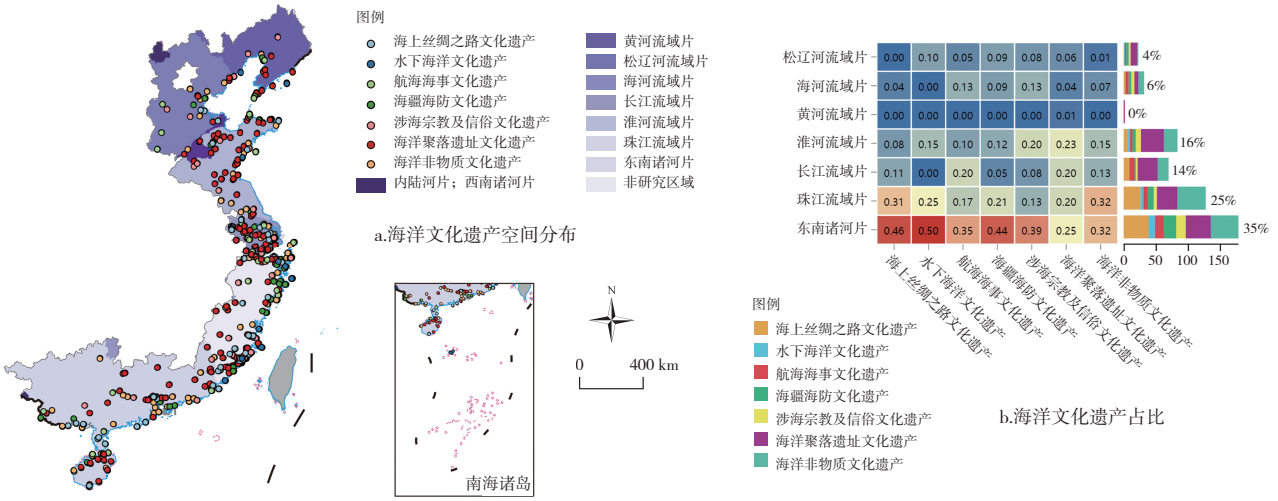


图5 流域区划内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及占比

Fig.5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shed zoning

发展空间也相对较小；此外，河流的交通运输功能又在沿海和内陆资源的交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结合现行文物管理体制和遗产资源现状，提出了基于海洋文化典型特征的分类框架；并以沿海11省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借助ArcGIS空间统计工具得出以下结论：①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集聚程度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海疆海防文化遗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水下海洋文化遗产＞涉海宗教及信俗文化遗产＞航海海事文化遗产，最佳聚类距离分别为186 km、199 km、210 km、144 km、139 km、183 km、194 km。②总体来看，南方沿海地区遗产数量显著高于北方；行政区划下，除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占比最大的省份在山东外，其他类型占比最大的省份均位于南部省市；方言区划下，航海海事、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占比最大的区域位于吴语区，其他类型占比最大的省份均位于闽语区；流域区划下，各类型占比最大的区域基本均集中于东南诸河片。③区划方式的改变使各类型遗产的集聚区域发生了明显变化。行政区划下遗产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北方遗产数量虽显著少于南方，但在海洋聚落遗址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上仍占有一定优势；沿海方言区的形成与海洋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29]，方言区划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地域差异也更具解释力；而流域区划使各区域遗产分布差异性更显著，对资源的整合度更高。海洋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汉语方言、流域的关联特征佐证了海洋文化遗产空间区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由于目前所建数据库仅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以此来表征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还需对海洋文化遗产名录不断更新和完善，以更完整、丰富的数据再现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对如下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行政区划为研究单元，政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海洋文化遗产的登录及空间分布；如何利用与海洋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有显著关联特征的区划方式，从定量角度对海洋文化遗产空间区划做出合理划定等。

4.2 开发建议

①发掘省域优势资源。行政区划在统筹并协调城市建设、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掘省域优势资源，是树立城市品牌形象，实现跨区域合作的基础。各类型海洋文化遗产虽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省份，但不同地区亦有其自身特色，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可进一步发掘地方优势。

②确定主题阐释框架。主题阐释是文化遗产阐释的方法之一，“主题”，即游客能够“带回家”的信息，它是易于被理解和吸收的，与抽象的、含混的遗产价值相区别[30]。阐释的目的在于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海洋文化的理解。借助主题阐释框架，建立基于历史事实联系的情境式结构，以勾画中国海洋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轮廓。

③构建海洋遗产廊道。海洋文化遗产具有线性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征，海洋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应首先建立在对遗产资源的摸底式排查基础之上；其次关联资源与历史，以确定相关主题的层次或维度，并根据主题内容划定遗产廊道的尺度和空间格局。海洋遗产廊道与主题阐释框架紧密结合，不仅能将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价值进行有效转化，服务于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是使海洋文化遗产“活”起来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曲金良.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几个问题[J]. 东方论坛，2012(1)：15－19.

[2] Westerdahl C. The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1992，21(1)：5－14.

[3] Henderson J，Breen C，Esteves L，et al. Rising from the depths network：A challenge-led research agenda for marine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Africa[J]. Heritage，2021，4(3)：1026－1048.

[4] Claesson S. The value and valuation of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2011，18(1)：61－80.

[5] 王苧萱. 中国海洋人文历史景观的分类[J]. 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5)：83－88.

[6] 赵平，项敏. 海洋文化遗产的分类策略与资源体系建构[J].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36(4)：32－37.

[7] 李加林，杨晓平. 中国海洋文化景观分类及其系统构成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11(4)：89－94，158.

[8] 麻三山，余玲. 环北部湾海洋文化遗产资源及构成体系综述[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7，38(1)：35－42.

[9] 蓝武芳. 京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2)：5－9.

[10] 刘丽娜，王晶，郭萍. 试论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制建设与国际合作[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4)：38－41，45.

[11] 曲金良.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

[12] 赵云，燕海鸣. 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文化遗产概念的知识生产[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1)：21－29，140.

[13] 张开城. 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30－36.

[14] 苑利，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J]. 学习与实践，2006(11)：118－128.

[15] 曲金良.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国际合作保护及其对策思考[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6－33.

[16] 曲金良.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合作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4(06).

[17] 张晓斌，郑君雷.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类型及其文化遗产价值[J]. 文化遗产，2019(3)：141－148，161－162.

[18] 李宏松. 明清海防遗存认定、分类及保护特性研究[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4)：63－69.

[19] Qu J L. Protecting China’s maritime heritage：Current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policy[J].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2012，1(1)：46－50.

[20] 杨国桢. 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J]. 海洋史研究，2014(1)：3－13.

[21] 郝志刚. 中国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41－54.

[22] 游汝杰，周振鹤. 方言与中国文化[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232－237.

[23] 詹伯慧.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J]. 方言，2002(4)：344－352.

[24] 季云起. 汉语方言的南北差异及其文化阐释[J]. 齐鲁学刊，2006(1)：158－160.

[25] 梁智尧，赵云，冯辽. 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空间区划及其规划策略[J]. 中国文化遗产，2022(5)：62－70.

[26] 郑翀，蔡雪雄. 福建省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与海洋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2016(5)：127－131.

[27] 潘悟云.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J]. 方言，2009，31(3)：193－203.

[28] 葛剑雄. 河流与人类文明[J]. 社会科学文摘，2022(1)：91－93.

[29] 陈晓锦，黄高飞. 海洋与汉语方言[J]. 学术研究，2016(1)：156－161，178.

[30] 韩真元，蔡超. 国外文化遗产阐释规划中主题阐释方法的解析与启示[J].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1(3)：9－13.